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灯塔”，宣称人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社会撕裂严重，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金钱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金钱政治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了选民真实意愿的表达，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近年来，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渐缩小。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 一、金钱充斥美国政治全过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本质。金钱是美国政治的驱动力。美国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只有在金钱燃料的推动下，才能持续前行。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润滑剂。离开金钱，美国政治根本无法顺畅运行。金钱政治贯穿了美国选举、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环节，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选举的本来目的是表达选民意志、确定政策方向和选择合格的领导者。但是，美国的金钱政治却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金钱深深植根于美国选举的各个环节中。在所有层级的选举中，筹集资金都是参选者的入门条件。没有足够的金钱，根本无法参加竞选任何重要政治职位。21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元、2012年的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美国中期选举费用也快速升高。2002年到2014年间举行的4届中期选举分别花费21.8亿美元、28.5亿美元、36.3亿美元和38.4亿美元，2018年则达到52亿美元。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参加竞选的可能。只有少数有能力筹集大量竞选资金的人，才能加入美国政治选举角逐。这无疑为富人和利益集团通过金钱笼络候选人营造了温床。

除公开登记的选举经费外，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8年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告捐赠来源，这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透明度。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非法“暗钱”持续涌入选举，不断创新纪录。2010年中期选举的“暗钱”为1600万美元，2014年中期选举的“暗钱”增加到5300万美元。到2018年中期选举，候选人以外的外部团体花费的“暗钱”剧增到9800万美元。在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40%是秘密捐赠者资助的。

### 二、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选举。通过选举把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人物推上国家领导职位，行使国家权力。为此，美国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政治体系和选举制度，对

候选人和选民进行层层筛选，以保证那些让富人满意的人当选。最初，美国对选民资格进行种种限制，剥夺大批美国公民（如少数族裔和妇女）的选举权。后来，金钱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控制选举的最重要手段。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金钱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钱是个选择器，可以用来淘汰来自底层的政治参与者，使得穷人代表根本难以成为候选人。富人通过资助竞选经费的方式挑选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们成为候选人，进而赢得选战。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是天作之合。富人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来保障，政治人物需要借助金钱来进行选举。富人为了维护他们在国家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有很强的动力主动介入政治运作，寻求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的各级代言人。他们拥有最大份额的社会财富，可以满足政治人物的资金要求。政治人物可以充当富人的政治代表。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政治人物必须占有更多金钱才能参与一场正常的选举，进而赢得选举。于是金钱极为容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

利益集团的活动生动诠释了金钱政治的内涵。利益集团指的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同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利益集团得以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利益集团的宗旨是参与权力运作过程，影响公权力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以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如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它们可以向各级政府施加压力，左右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已深深嵌入美国行政机构、国会和司法系统之中，与政党和政府并列为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有很多种，如提供资金、直接介入选举过程、帮助特定候选人赢得选举等，从而影响国会立法和未来政府决策；通过刊登广告、发表广播和电视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影片等方式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对立法者和政府决策者进行游说，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美国的政府决策和国会立法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利益集团就是金钱政治的标本。利益集团的活动处处离不开金钱，是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其功能就是将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利益集团的资金越充沛，它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而金钱绝对掌握在富人手中。穷人也可以组成利益集团，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注定不会发挥很大影响。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影响的还是一些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组织，因为只有这些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资金。例如，在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企业花在选举上的资金是工会的10倍。虽然2010年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支出限额取消了，但许多工会组织已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无力进一步增加政治支出。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急剧增加，影响力迅速扩大。企业加大政治投入当然是为了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放大自身利益。

游说是金钱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游

## 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19年12月

说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游说的法理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年的《联邦游说管理法》、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和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形成了规范游说活动的法律体系。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允许各群体结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因此，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利益集团雇佣说客，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谋求自身利益。40多年来，美国游说业发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个注册说客，到1981年增加到2500个，2009年又增加到13700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利益集团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年为14.4亿美元，2011年已狂飙至33.3亿美元，14年间增长幅度达131%。

### 三、美国金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世纪后期，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成为“政治分肥”制度。竞争获胜的政党通常将官位分配给为选举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本党主要骨干和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政治分肥”造成政治腐败蔓延，官员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试图对政治捐献做出一些限制，但没有改变美国民主制度的金钱政治本质。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和后门，实际使金钱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捐款限额。“超级筹款人”是拥有大量财富和社会关系的人，比如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管理人、演艺界明星或说客。他们人脉多，神通广大，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把大量小额捐款人凑在一起，为候选人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个人筹款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000个“超级筹款人”帮助完成的。同时，“超级筹款人”制度还能绕过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接受捆绑捐款的候选人，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金主。这使得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取消对“软钱”的限制。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了那些通过捐给政党来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软钱”，即不受《联邦竞选法》限制但又用于影响联邦选举的资金。但是，这个法律受到持续挑战。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威斯康星州‘生命权利’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裁决，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有关限制企业、工会和贸易团体资助特定选举广告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关于竞选最后阶段限制公司、工会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相关规定违反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裁决

将《两党竞选改革法》的内容否决殆尽，使得“软钱”可以合法地大规模进入选举活动，打开了金钱肆意流入政治的闸门。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

第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金钱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政治行动委员会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种由企业或独立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筹款机构，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对个人和机构政治捐款的限制。它们从许多个人手中收集金钱，然后决定为哪些候选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代表它们进行造势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实际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参与选举的“白手套”。1971年《联邦选举法》通过后，政治行动委员会由于限制较少而进入大发展时期。大量企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金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管道参与竞选。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企业与个人向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由此，政治行动委员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根据无党派非营利研究机构“政治责任中心”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8日，美国登记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2316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强大的募款实力，在各个方面对选举产生影响，尤其是企业和富豪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无限制地投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而间接影响选举。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捐款最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优先行动”，达到1.76亿美元。富豪索罗斯向“美国优先行动”捐款600万美元，而对对冲基金管理人托马斯·斯泰尔更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5700万美元捐款。

### 四、金钱政治后果恶劣

第一，金钱政治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尽管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但美国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实际上受到严苛限制。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2010年至2015年，美国有21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的新法律，有14个州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实施了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穷人登记投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9个州通过立法，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10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州选民人口的3%。这导致美国选举投票率降低。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全国的平均投票率仅为37%。

第二，政府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

禁脔。按照美国政治惯例，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人通常会把一些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选举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户和重要筹款人。美国历任总统上任后，都会任命一批金主当驻外大使。2000年总统选举后，政府中三分之一的新职位被胜选总统的亲友和金主接掌。

2008年总统选举时支持胜选总统的556名“超级筹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时任政府内阁中获得职位或者成为顾问，其中筹款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有近80%都获得了重要职位。

第三，金钱政治明目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政治献金带来的一个恶果是，少数富人拥有了比绝大多数人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政府政策图利富人，损害穷人利益。金钱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富人通过竞选捐款和利益回报承诺俘获政客，使政客代表他们的利益立法。通过金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必定会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钱人倾斜，或明或暗地向资本输送利益。这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众所周知，2017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有“减税”之名，但并非普遍减税，而只是给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穷人反而要加税。根据这个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大幅降低，从39.6%降至35%，足足降低了4.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贫穷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却从10%增加到12%。这个法案使最贫穷家庭遭受金钱损失，最富有家庭获得巨大收益。2017年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6%的美国人反对这一税收改革法案，支持的只有29%。就企业税收而言，《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降低了15个百分点，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相反，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税政策，需要根据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7%。金钱政治蚕食了社会平等，从根本上腐蚀了美国的社会公正。

第四，金钱政治增加解决紧迫政治社会问题的难度。在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一个困扰社会多年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校园枪案和公共场所枪案等大规模枪支暴力案件时有发生。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事故和自杀，有1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有20多万人因枪击受伤。如果严格控制枪支，这些伤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步枪协会等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通过介入选举和进行游说成功地瓦解了控枪努力。这些利益集团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仅2010年至2018年间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1.13亿美元。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反控枪组织，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游说组织，每年运营经费高达2.5亿美元。竞选年份经费更多。由于投入大量金钱，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反枪支管制利益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封杀了所有控枪法案，使美国枪支管制更加宽松。

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楷模”，要全世界都向它学习。但是，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的谎言。美式民主是富人和资本家的民主，跟下层民众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只有口袋里有多数金钱的人才能享受。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式人权”。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河南漯河：

# 党建工作延伸到每个角落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崔杰斌

昔日的贫困村，变成充满活力的美丽乡村；曾经的脏乱差城中村，变身为人们眼中的香饽饽……田间地头、阡陌小道，随处可见党员干部的身影。在河南漯河，这些变化温暖而细腻，赢得百姓“点赞”。

强化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每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基层党建的重中之重。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原先为省级贫困村，按照“围绕脱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的总体思路，刘庄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提供就业扶贫、光伏扶贫、金融扶贫等帮扶措施，实现每个贫困户享受两种以上增收帮扶措施，呈现基层党建工作 and 脱贫攻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2015年刘庄村实现了整村脱贫，2018年底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40余万元。

同样在临颍县新城街道邢庄村，昔日的脏乱差城中村，短短几年村容村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得益于党员发挥的基层带头作用。邢庄村是典型的都市村庄。村民长期固有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使得广大村民靠仅有的几分地维持生计。邢庄村按照“规划引领、自主改造、基础先行、区块开发、收益归村”的改造模式，村党委先后组织成立村民自主改造委员会、“村民之家”等村民自治组织，全村85%以上的党员成为推进各项工

作的中坚力量，搭建了干事创业平台、凝聚了发展合力。村集体每年出资1000余万元，为群众提供统一供水、统一供面、统一缴纳新农合、统一缴纳物业费等多项福利，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群众想什么，党员干什么。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红色阵地建设，是基层党建的关键所在。

“走到居民家里，面对面听群众讲问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制成台账、加快协调解决。”这是郾城区龙塔街道巴山路社区党委全面开展的“百人进万户”大走访、大调研活动。隶属该社区的天鑫现代城的物业问题，是老大难问题，居民曾因此和物业常年发生纠纷。在此次整改中，社区工作人员耐心梳理，找到问题的根源，通过多次协商，最终让居民和物业达成一致，有效解决了问题。

“社区工作就是帮助群众解决麻烦事的。”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勇杰介绍，该街道开设了9个社情速递服务站，主要为居民提供一些及时便利的服务项目，收集辖区党员群众的求助、意见和建议。截至目前，社情速递服务站共解决各类居民诉求1000多件，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300多次，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同样，在舞阳县辛安镇，村民们感受着党员们的贴心服务。“今天有专家讲小

麦、玉米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知识，我们专门赶过来听课，学到了不少知识。”村民乔凤兰对记者说。辛安镇整合党建资源，高标准建成便民服务、党建展览、多功能培训、农产品展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党群服务中心，填补了舞阳县综合型乡镇红色教育基地的空白。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源汇区昌建广场4楼的马路街街道非公企业党建活力联盟，荣誉墙、员工风采、企业文化等板块格外引人注目。

“近年来，源汇区中心商业区持续繁荣，并且建成运营了全市最大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昌建广场。马路街街道非公企业党建活力联盟顺利组建，是漯河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探索和尝试。”张勇杰告诉记者，该联盟还成立了“党建活力联盟流动党支部”，通过党建凝聚年轻人，引领年轻人，以党建引领创新发展，培育契合市场、企业发展的文化气质，树立符合企业党员的党建品牌，让党建充满青春和活力，走出一条“旗帜红 企业兴”的路子。

“下一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将立足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开创活力焕发的基层党建工作新局面。”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

广西藤县农民工创业园：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童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在广西藤县天平镇新兴村蓝宇玩具厂油色车间，工人正在用喷枪对玩具进行整体喷色。在另一栋装修中的崭新厂房前，邻近村的几位村民正在认真填写履历表应聘。

“在玩具厂上班离家近，不用去外地打工，方便照顾小孩，而且工作比较简单，手快一点拿到的工资就高一点。”天平镇罗平村村民唐宏玲高兴地交上了应聘油色车间工作的履历表。

蓝宇玩具厂是该县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支持群众返乡创业就业的一个缩影。藤县邻近广东，当地有不少人外出务工、经商。但近两年来，从珠三角地区返回家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为解决群众就业难题，该县在新兴村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促就业。在农民工创业园内的部分企业里，还设有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蓝宇玩具厂行政部主管卢年达向记者介绍，他们总公司在东莞，来到新兴村农民工创业园投资设厂，目前部分车间已经试运行，全面投产后可为当地提供1050个就业岗位，员工每月计件工资可达4500元。

“如果没有企业进来，再好的规划也是空谈。”新兴村党总支书记杨耀庆认为，产业发展应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据了解，藤县农民工创业园的定位是发展家具、服饰、玩具、电子产品等用工量大的产业。目前，已吸引23家企业入园并投产，提供了1800多个就业岗位，大部分为镇易地扶贫就业人员搬迁项目安置点及周边镇村的搬迁户、贫困户、村民。

“镇政府从帮助困难群众就业实际出发，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排在农民工创业园旁边，增加贫困户的就业机会。我们还通过招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用工量比较大的企业进驻园区，让更多贫困户就业。”天平镇党委书记丘启周说。

“今年以来，藤县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认真落实促进就业政策，鼓励开发和稳定就业岗位，促进各类劳动者公平就业，支持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助力脱贫攻坚。通过加快推进县农民工创业园建设，以创业带动就业，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藤县委书记黄东明介绍，今年1月份至8月份，该县城镇新增就业6289人，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为促进贫困人口就业脱贫，该县还开发多种形式的公益性岗位，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劳务补助等方式，激发群众劳动致富积极性。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极度贫困户，确保按政策给其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据悉，目前该县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已帮助有就业意愿但因家庭原因难以外出务工的贫困家庭劳动力2000多人实现就近就业。